

话说玉耳杯

——“觴”、“羽觴”、“耳杯”的关联

李 凯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员
王建玲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员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西安市三道巷在基建过程中发现一汉墓，出土一件罕见的椭圆形双耳玉杯（图1.1），杯长10.1、宽8.6、高3.4 cm；浅腹、腹外饰浅浮雕云气纹；两短侧以高浮雕技法饰有牛首，牛双目圆瞪，双角向上，英姿勃发；杯的玉质润泽浑厚，纹饰流丽，十分精美。当时根据此物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、流行于汉晋时期的耳杯形状相似，故定名为“玉耳杯”，后更名为“玉羽觴”。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认为羽觴是和耳杯为同种饮酒器的缘故。但最近笔者在制作文物档案的过程中，浏览了一些文献资料，在此过程中注意到了羽觴一词的来源，发现它和耳杯并无确切的词义演进关系，之所以能把它等同起来，主要来自历代的注解与逻辑推理，而其间的关系，值得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。

一、作为圆形酒器的“觴”、“觥”、“卮”

《韩非子》：“禹作为祭器，墨漆（染）其外，而朱画书其内，纁（纁）帛为茵，蒋（草名）席颇缘，触酌有采，而樽俎有饰。”^[1]这可能

期毕竟距石器时代已经久远，记录显得十分模糊。就现今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来看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也绝少发现或确定哪种陶器属专用饮酒器，可见当时饮酒有限。而历代出土的诸多青铜器和史料证明，在青铜时代，饮酒器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使用得十分普遍，门类繁多。青铜酒器的名称主要来自古代文献的记录和出土物的自铭文，但彼此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器形常让今人感到困惑，这主要是因为历朝历代对金文考释存在多种不同说法，文献资料在叙述的过程中又过于艰涩扼要，且由于历史的更替、语言文字的演变、文化的变迁积淀、饮酒习俗的改变、酒器名称和器形的衍化，等等，很难一一对应所致。而后，从青铜酒器衍生出来的古代金、银、玉、角、陶、瓷、玻璃等质地的酒器形状又千变万化，其名实相应也存在了问题。

我们注意到，“觴”这种在青铜时期出现、并被历代称道的酒器，不但较其他青铜酒器多出一项

动词词性，而且其确切的形制，也很少在文献中得到直接肯定，只能间接地在一些文献的字里行间寻找解释，从而推论它的形制。例如，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说“觥”：“乡饮，酒角也。《礼》曰：‘一人洗，举觥。’觥受四升。”^[2]“觥”是在乡饮酒礼上所用的酒器，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：“盥洗，扬觥，……”^[3]它是种较大的饮酒器。许慎在同一书中解释“觴”的时候说道：“觥实曰觴，虚曰觥。”那么“觥”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在关于“卮”的解释里可以间接了解到：“卮，圆器也，一名觥。”“觥，小觥也。”以此推论，觥是大一些的卮，为一种圆形酒器。在宋代编辑的《博古图》和近代图典中对“觥”的形制有着明确定义，它与青铜壶器形近似，但较小，器身呈筒状、圈底、深腹，有的有盖（图2）。《礼记》一书是西汉时期儒生注释整理的，加入



图1.1 椭圆形双耳玉杯(短侧) (汉)
长10.1、宽8.6、高3.4 cm
1983年陕西省西安市三道巷出土

了很多汉代人的观念，当时人们可能认为在商周时期，“觴”、“觥”、“卣”同为筒状圆形酒器。在1983年广州市著名的南越王赵昧墓就出土一件西汉早期精美的镶玉卣（图3），似深腹杯。

二、“觴”多样的词性是其形制善变的根源

《礼记·礼器》在叙述“以小为贵”的时候多次说到“觴”，其词性随语境变化。“总名曰爵，其实曰觴，觴者饒也”^[4]。“觴”是指饒、献酒的总称，所以“实曰觴”，大概是因“觴”有非名词的特性。“宗庙之祭，贵者献以爵，贱者献以散，尊者举觥，卑者举角。”注曰：“凡觴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觥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”^[5]“觴”指代了酒器，并说明所有饮酒器按其大小分类，越小，越显得尊贵，越不失身份。这是因为：“一升曰爵，爵，尽也，足也。二升曰觚，觚，寡也，饮当寡少。三升曰觥，觥，适也，饮当自适也。四升曰角，角，触也，不能自适，触罪过也。五升曰散，散，讪也，饮不能自节，为人所谤讪也。”“五献之尊，门外缶，门内壶，君尊瓦甒。此以小为贵也。”^[6]“觴”多是作为动词在使用，像这样使用的还有《吕氏春秋·达郁》：“管仲觴桓公。”《战国策·秦策》：“王觴将军”等。在后代也常如此使用，如，晋陶渊明《乞食》：“谈谐终日夕，觴至辄倾杯。”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，仍保持对“觴”的动词性解



图2 青铜直纹觥（商后期）
高18.7、口径8.4cm 1969年
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西区出土



图3 镶玉卣（西汉）
高14、口径8.6cm 1983年
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赵昧墓出土

释。

正因为“觴”这种词性与众青铜酒器不同，使它的概念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了转变。首先在一些文学辞章中“觴”便以“羽觴”的面貌出现，被文学化了了的“觴”，形制模糊起来。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瑶浆密勺，实羽觴些。”^[7]西汉末，班婕妤写的《自悼赋》：“仰视兮云屋，双涕兮横流。顾左右兮和颜，酌羽觴兮销忧。”^[8]以班婕妤的《自悼赋》和《楚辞·招魂》比较，不难看出班赋与前者的相像痕迹，只是一个字眼的改动而已。因为《楚辞》为西汉刘向整理，所以难分辨“羽觴”一词究竟出于何时。后人认为，辞中“羽觴”一词应该是指某种“插羽其上”以求速饮的酒器^[9]，但对应哪种器形，很少解释。唐代的训诂名家颜师古在注释《汉书》时，注引三国时代孟康的解释：“羽觴，爵也，作生爵（雀）形，有头尾、羽翼。”^[10]这是人们看到最为直接解释“羽觴”器形的说法。至少三国时期，人们认为“羽觴”同“爵（雀）”有着相似的形状。后世所谓的“插了羽毛”，大概等同于那一双鸟翼。“觴”前加了一个“羽”字作为限定，使得其形制难以确认。古人制器，观物尚象，因为有种称为“爵”的鸟，它的叫声“节、节……”，很似“足、足……”之声，人们所以认为它有“能飞而不溺于酒”^[11]的特点，将酒爵做成鸟状，意在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酒乐，这和《礼记·酒器》

里解释“爵”只容“一升”，意在促使人少喝酒，喝“足”即可之意相辅相成。而“觴”我们前面已经谈到，商周时期它是和觶相同，是类似小青铜壶式的圆形饮酒器，就形制而言和爵大相径庭，西汉时人大约已分不清楚这种区别，带有动词词性的“觴”也名词化，只有用千古不变的饮酒之风将“觴”和“羽觴”联系起来。

三、“曲水流觴”和耳杯

将“羽觴”一词更为光大的是晋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所描绘的景象：“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觴曲水，……。”这就是后代文人一再推崇的“曲水流觴”。能与“曲水流觴”使用的饮酒器具对应的，就是今人从多次出土文物里看到的漆耳杯。耳杯，是种饮食具，兴起于战国，亦为汉代荆楚地区漆器的代表器形，晋以后少见。今人根据西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上自铭文“栢（杯）”^[12]，以及其具有双耳的器形特点定名。它质轻，又有两耳设计，可以漂浮于水面，如果真有“曲水流觴”，那么使用的酒杯一定是这种漆耳杯。到了唐代，“羽觴”在诗词歌赋中的出现已很普遍，李白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曰：“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觴而醉月。”“羽觴”似乎成了人们生活里的饮酒器皿。但是，诗词的抒情和实际的出土情况存在了矛盾，据近代考古出土文物的分析可知，隋唐以后耳杯几乎很少见到，屡屡见到的却是各种材质的无耳椭圆形长杯，故“羽觴”就是耳杯的

说法值得商榷。

如果诠释耳杯的来历，可能和古时的匏饮有关，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：“执豕于牢，酌之用匏。”匏就是葫芦。传说，古人在新婚之夜，让新人用匏杯喝酒，是因为匏苦不能食，意在以后的日子里甘苦与共。解葫芦为匏杯，大约是从新石器时代就有的习俗，西安半坡、宝鸡北首岭、甘肃马家窑的仰韶文化都有匏形彩陶瓶（亦称细颈瓶或蒜头壶）出土。其中宝鸡北首岭的“鸟鱼纹细颈瓶”所装饰的鸟衔鱼纹，也正是预示了一场部族之间的婚姻关系^[13]。春秋时期的韩非子说，禹作的祭器“墨漆（染）其外，而朱画其内。”推想和漆耳杯的创意多有相像。如今，以荆楚地区出土的漆耳杯最为多见，大概这和地域物产、饮酒习俗甚至气候温度有着直接关系。1966年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一件秦代“修武府温酒炉”（图4），与此器连同出土的还有四足铜耳杯（以下称“修武府耳杯”），对我们认识耳杯的发展与变迁有一些启发。“修武府温酒炉”器身有铭文“修武府”。“修武府”战国时属魏地，后并于秦。此器“炉口呈圆角矩形，有四矮蹄足”，“耳杯四足，两端有铺首衔环。”^[14]耳杯带足，并做为温酒炉的附属物，十分罕见，这是和北方以蜀黍做酒，喜爱加温饮用相关。而“修武府耳杯”两短侧，饰以“铺首衔环”，则正和西周以降有的青铜壶外腹有兽头装饰暗合。这件耳杯兼有了青铜壶、漆耳杯、三足爵各自的特点，就时代来研

判，可以认为这是一件与时代进步相和，具有区域性特征，正在变型过程中的酒器，但它和诗词中的“羽觴”相比，不但与“爵（雀）”的形状相去甚远，又缺少了那么多的诗意。从其他的西汉时期的铜温酒器看，与之相配的耳杯的双耳是放在温酒器上的两个支点或握持的把手，有着实用的意义，和所谓的“有头尾、羽翼”、“插了羽毛以求速饮”等说法毫无关系。

以“修武府耳杯”与西安市三道巷出土的椭圆形双耳玉杯相较，我们不难看到，两者除有足、无足这点之外，其他形制非常接近。两者都有半月形双耳、浅腹、平底、短侧饰有兽首的共同特点。“修武府耳杯”因是铜器，又作于那个青铜文化衰落的变动时代，外无纹饰。西安三道巷出土的双耳玉杯，外饰以成组的浅浮雕云气纹，装饰华丽，这和汉代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不无关系。那么这就是能使班婕妤“销忧”的“羽觴”吗？从精美的雕琢以及似云似雾的“仙气”看，好像有些关系。但“羽觴”一词，在其时的其他典籍里再难看到。特别是奉献于当朝皇帝和所赐与宫人的物品记载中少有这样的记录，反而关于“卮”、“栢”的记



图1.2 | 玉耳杯(长侧) (汉代)
西安市三道巷出土



图4 修武府温酒炉 (秦代)
耳杯长15、宽12.9 cm
1966年陕西省咸阳市塔儿坡出土

载往往多见：“沛公奉卮酒为寿。”^[15]“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。”^[16]；《西京杂记》：“遗飞燕……香螺卮（出南海，一名丹螺）。”^[17]伦敦大英博物馆藏“元始四年漆耳杯”上有自铭：“漆雕画木黄耳栝（杯）”^[18]，据《博古图》记载“建光（公元121年—122年）卮，两耳，铭六字，形若杯。”^[19]这是东汉后期情况，大概直到东汉末期耳杯还称“卮”或“栝”。足见“羽觞”一词，仅见于诗词之中，起码不是当时京畿地区的流行酒器或对耳杯通行的称谓。

综合以上分析，笔者认为：在秦汉时期，“羽觞”是以带有浓重文学色彩的修辞来代指酒，并非确指某种酒器。在商周时期，祭祀祖先时会用一种酒“鬱（郁）鬯”，据说是用秬（黑黍）和郁金香酿造的香酒，而郁金香为遥远西方的郁人所贡^[20]，十分贵重。笔者大胆地推测，“羽觞”和“郁鬯”是否在诗人的辞章中以谐音出现呢？如果身历诗人描绘的天上世界，作为已歿且升天的先人，喝上一杯后代供奉的“郁鬯”酒消忧，倒也顺理成

章。笔者也注意到班婕妤《自悼赋》和《楚辞·招魂》的题材都是祭悼，这不应该仅仅是巧合，他们说的是否为一种酒的名称，而不是酒器呢？恰巧，“爵”的籀文字体，其左下方就是个“鬯”字，而“觞”在籀文中又从“爵”，“觞”和“爵”、“鬯”在古代字形上是有关联的。1978年3月河北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出土的一对“叔劝父卣”，自铭为“兄为女（汝）兹小鬱（郁）彝”，“郁”当是“郁鬯”之省称^[21]。可见单字“郁”亦指酒，“羽”是否是“郁”的音讹，“羽”在作献酒意的动词“觞”前作为修饰，是否指献给先人的“郁鬯”——香酒。当然，这仅仅是笔者的一个推测，需要有更直接的材料来证明。但是，以秦汉时期诗味甚浓的词语来意会命名其时文物，似为不妥，这件汉代玉杯还是称“玉耳杯”为好。至于隋唐时期，“耳杯”已经无耳，且形制有了极大变化，并普遍使用，为这时的无耳椭圆形长杯定名“羽觞”尚可。

以上拙见，盼方家指正。

注释：

- [1]（清）王先慎，钟哲点校：《韩非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。
- [2]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1963年。
- [3]陈戎国：《礼记校注》，岳麓书社2004年。
- [4][6]（汉）郑玄注，（唐）孔颖达等正义《礼记正义》注引《韩诗》，载黄侃经文句读《十三经注疏》之六《礼记正义》附校勘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

《礼器第十》第452页。

- [5]杨天宇：《礼记译注》（下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[7]（战国）屈原：《楚辞》，吉林摄影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[8][10]班固：《汉书·外戚传下·孝成班婕妤》。
- [9]（宋）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楚辞卷第九，招魂章句：“觴，酒器也。插羽于上。”
- [11]（清）陈元龙：《格致镜原》卷四三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，扬州古籍书店1989年，第499页。
- [12]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和1977年安徽双古堆一、二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均有自铭“栝”。
- [13]刘夫德、李凯：《关于细颈瓶》，《文博》2007年2期。
- [14]李西兴：《陕西青铜器》，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[15]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
- [16]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66页。
- [17]（晋）葛洪：《西京杂记》第30节。
- [18]引自：索予明《中国文物·漆器》，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，第23页。
- [19]（清）陈元龙：《格致镜原》卷五一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，扬州古籍书店，1989年，第577页。
- [20]（汉）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鬯，百草之华，远方鬱人所贡。”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第106页；《梁书·中天竺传》：“鬱金独出罽宾国。”
- [21]河北省文物管理处：《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》；李学勤、唐云明：《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》，《考古》1979年1期。